

桂冠叢刊⑬

中國大陸的 改革與發展

陳一諮、李少民
于大海等著



桂冠叢刊⑬

中國大陸的改革與發展

陳一諮 于大海 李少民等著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中國大陸的改革與發展／陳一諮等著.--初
版.--臺北市：桂冠，1991 [民80]
面：公分.--(桂冠叢刊；13)
ISBN 957-551-431-9 (平裝)

1. 中共政權-論文, 講詞等

628.76



80001438

桂冠叢刊⑬

中國大陸的改革與發展

原 著／陳一諮、于大海、李少民等
出 版／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發 行 人／賴阿勝
地 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6-4號
電 話／3681118·3631407
電傳(FAX)／886 2 3969194
郵撥帳號／0104579-2
登 記 證／局版臺業字第1166號

印 刷／海王印刷廠
初版一刷／1991年6月(印數：1~1000)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

ISBN 957-551-431-9

定價／新臺幣150元

目 錄

《中國大陸的改革與發展》序言	1
陳一諮 引言：中國大陸的制度變革及其成敗	3
程曉農 在中國大陸改革困局的背後：過程與現狀的社會經濟分析	9
文貫中 中國大陸農業制度的變遷與農業生產力變化初探	31
張 欣 論在中國大陸實施區域經濟自治	51
李少民 中國大陸的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	67
楊炳章 從中共中央軍委的變革演化談中國政治與軍事的關係	83
楊小凱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教訓	99
吳國光 自由：推進中國現代化轉型的基本導向	123
陳奎德 社會設計還是自然主義？	153
于大海 從中國民聯的經驗談海外大陸民運組織的發展	177
作者簡介	201

《中國大陸的改革與發展》

序言

近年來，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形勢都發生了急劇的變化。一九八九年春興起的愛國民主運動，已被坦克和機關槍暫時壓了下去。為大陸人民帶來生活改善與希望的十年經濟改革，在「六四」後陷於全面停頓。舉世矚目的海外大陸民主運動，亦已遭遇到重重困擾，出現了暫時的低潮。這一切使得許多熱血的中外人士感到困惑和失望。人們不禁要問，在經歷了一百五十年的艱辛和動盪後，中華民族的厄運難道還不該終結嗎？

誰也不能準確地預測未來。但是，誰又都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來影響未來。有鑒於改革和民運在理論上、思想上準備不足的教訓，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余英時先生和前大陸國務院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諮先生於一九九〇年四月在美國發起成立了當代中國研究中心。這個研究中心的宗旨，是集中海內外專家學者的智慧，研究當代中國的基本問題，力圖制定出可供選擇的治國方略，以最積極、最具建設性的方式促進中國大陸的經濟市場化和政治民主化。

自成立以來，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已依循以上宗旨組織進行了多項座談會和寫作研討會，並已初步展開了未來中國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社會政策的設計。研究中心還公開招收了研究計劃，建立了研究員制度。

本書是桂冠圖書公司《當代中國研究叢書》的第一集。本書收入的，是提交給一九九〇年九月當代中國研究中心關於中國前途的研討會的論文。這些論文，涵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個方面，顯示出研究中心立意之宏大。同時，論文的作者又多是來自中國大陸的年輕學者，他們雖然有豐富、獨特的生活經驗，在按現代規範治學方面則還有待進一步的錘煉。作為本書的編者，我們衷心希望海內外學者對本書收入的論文加以指導。

我們也希望本書能進一步引起各方學者，尤其是臺灣學者研究大陸問題的興趣。由於歷史的、地理的，以及當今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聯繫，無論臺灣的政局今後怎樣演變，大陸的改革與發展，都將會對臺灣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所以，準確地把握大陸的改革與發展，對臺灣來講至關重要。同時，臺灣學者現在可不受拘束地與在海外的一大批最優秀的大陸學者合作，研究大陸問題的條件可謂空前之好，良機切不可錯過。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已與臺灣的國家政策研究資料中心等單位建立了合作關係，並期望今後與臺灣更多的研究單位和學者就共同關切的問題展開聯合研究。

本書的編輯工作得到了吳國光先生的支持，並得到了王延碧小姐和袁慎謙先生的有力協助。我們在此向他們一並表示感謝。我們並要對東亞研究學會（East Asian Research Society）的贊助表示感謝。

編者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

引言：中國大陸的制度變革及其成敗

陳一諮

一、共產主義體制的變革

儘管中國大陸的制度變革遇到了挫折，東歐和蘇聯的變革卻取得了更大的進展。歷史的發展已經證明，以共產黨一黨專政為特徵的集權政治和以國有經濟為主體、行政指令為特徵的計劃經濟，是違反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的，是壓抑人性的，因而也是沒有效率的。在這些國家的變革中我們可以看到：

第一，不變革沒有出路，因為人們沒有積極性，因而抑制了社會，經濟的發展；而進行變革則意味著這種制度的分解，如果變革成功，那麼這種制度就不存在了。但僅僅從經濟制度變革的角度來看，還沒有一個國家能夠進行成功的分解。如果變革受到了挫折，那麼反對這種變革的領導人就會處在一種進退維谷之中，因為他們企圖把變革重新納入舊的體制已經是不可能的了，而前進又是他們所不願意的，因為他們會因此而失去原有的特權。但遲早這種變革仍然必將繼續發生。

第二，在這種制度的變革中，經濟制度的變革如果沒有政治制度的變革作為保障，是很難取得成功的，因為，往往當經

濟制度的變革觸及到公有制問題就變成了政治問題，不掃除政治上的障礙，經濟上的變革就很難進一步深入，中國改革的挫折主要原因在此。而政治制度的變革必須以經濟制度的變革為基礎，政治制度的變革可以掃清變革中的主要障礙，但是，沒有經濟制度的變革，就不能夠給人們帶來更多的經濟利益，那麼人們對政治改革的支持和熱情就會有所下降，並且對改革表示懷疑，甚至於轉變為反對，蘇聯的變革目前已面臨著這樣的困難。

第三，所有企圖改變這種制度的國家都遇到了這樣的難題，即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經濟制度的變革中，如何找到有效的過渡的方式；從集權政治到民主政治的政治制度的變革中，如何組合起有實際推行能力的政治力量。這兩個問題可以說是這種制度國家的普遍問題。第一個難題，實際上遇到的是一個資源配置方式的重新組合的問題，第二個問題是一個權力配置方式重新組合的問題。困難在於，共產主義革命消滅了一切獨立的個人和獨立的組織，這場變革意味著社會的全面重組，是一場非常深刻的，從根本上進行的制度變革，也可以說是人類發展中要解決的一個大難題。

二、中國大陸十年改革的成功和挫折

中國大陸進行了十年改革，為什麼會遇到重大的挫折？可以說是由於：第一，幾千年東方專制主義的延續；第二，戰時軍事共產主義的繼承；第三，蘇聯史達林模式的移植。這三個因素的迭加在中國建立了一個比蘇聯和東歐更加嚴密的，帶有封建軍事獨裁性質的體制。這種體制的最大特點就是中國共產

黨把所有的政治組織，立法組織，行政組織，司法組織，軍事組織，經濟組織，社會組織，文化組織，教育組織，宗教組織以至於每一個人都嚴密地控制起來。它是用剝奪每個人的財產權來控制每一個人的生存權，來剝奪每一個人起碼的人身權力和人身自由，當然也就根本談不上什麼「民主」。沒有任何一個組織獨立地代表人們的利益，沒有任何一個機構能夠獨立地傳達來自民間痛苦的呻吟。中國的這種制度使得從一九五六年以後的二十多年間，每人平均的國民所得沒有什麼增長。到了一九七八年，全國八億農民的生活處在非常困難之中。兩億農民吃不飽、穿不暖。而在文化革命中，又有兩億人民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批判和迫害，人們的不滿使得中國政府不得不進行變革。

第一，農村變革的初步成功，主要表現為：人民公社的解體從根本上動搖了計劃經濟的基礎。中國的農民在一九七八年以後自發地實行了包產到戶，衝破了人民公社「集體勞動加工分」，也就是奴隸勞動加平均分配的體制。農民勞動剩餘的產品可以自己自由地支配，因而調動了他們的生產積極性，物質財富大量的增加，農民在改革中純收入增加了二點六倍。但是，勞動、資本和資源還沒有能夠形成自由組合，所以形不成規模效益，致使八四年以後農村的發展又陷於停滯。但是，無論如何人民公社的解體改變了計劃經濟用低價格徵購農產品形成轉移價值發展重工業的格局，計劃經濟沒有了穩定的依托。

第二，城市經濟改革雖然步履艱難，但是，多種經濟成份的發展，特別是集體經濟，鄉鎮經濟，私人經濟，個體經濟和一些外資經濟的發展，改變了國營經濟一家獨大的局面，大大地活躍了城市經濟生活。而向地方和企業的放權又大大地消弱了計劃控制和中央集權。比如，計劃控制的物資70%進入了市

場，計劃分配的資金70%已經不再由計劃直接分配，這就使得中國的經濟格局出現了新的變化。十年改革以後，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已經從佔全部財政收入的70%下降為30%。但另一方面，雖然從一九七九年試點，一九八四年全面展開的對企業制度，流通制度，金融制度，財稅制度，外貿制度，住房制度，福利制度等等方面，不同程度地進行了改革。但是，有幾個基本問題一直未從根本上解決：第一，國營企業始終未能作到自負盈虧，國有資產的增值無人負責的現象始終沒有得到解決；第二，不能形成一個完整的市場體系；第三，政府也不能放棄對企業的直接管理。不進一步解決黨政不分，政企不分的體制，經濟變革的重重障礙就無法克服，一九八七年通過的政治改革的決議未能實行，即胎死腹中。因為黨政分開的做法嚴重觸犯了長期壟斷政治權利的那些黨內既得利益者。

第三，開放政策的實行，使得新技術，新觀念大量輸入，打破了中國長期閉關鎖國的局面。人們雖然對改革中出現的種種弊端不滿，但再也不願意回到原有的不合理體制。沿海開放帶的形成使得改革和開放形成了互相策應的局面，也使得中國不可能再退回到舊體制。

三、中國大陸改革的危機和展望

中國大陸的改革在一九八八年陷入了一個全面的危機之中。不管有多少原因，它的實質還仍然是上述的兩個：也就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改革，解決不了獨立產權問題，解決不了明確財產關係的問題。而特別是解決公有經濟的產權問題變成了政治問題，上層的決策發生了極大的衝突；而從集權政

治向民主政治的變革，又沒有形成獨立的社會和政治力量，使得政治改革很難進行。八九年「民運」正是人們對改革停滯的不滿而引發的，而六四屠殺則是那些爲了維護經濟政治特權的人，清算十年改革的一場改變。

中國大陸目前雖然呈現出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思想文化全面倒退的局面。十年來推行改革的代表人物或者是遭到逮捕，或者是被通緝，或者是遭到批判。但是，十年制度變革已經形成的經濟政治格局不是那一個人能夠隨意改變的。人心所向，大勢所趨，必然會使李鵬當局的強硬路線逐步軟化。因爲只有代表了中國人民本質追求的領導人，才能在中國的舞臺上繼續存在下去。從這點說，中國的制度變革失敗給了我們許多教益，同時它也孕育著進一步的更大的變革。

在中國大陸改革困局的背後：過程與現狀的社會經濟分析

程曉農

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歷經十年，到一九八八年末就已陷入舉步維艱的泥沼。「六四」之後，倒退的經濟政策試行了半年，又是處處碰壁。在這種「進不能、退不得」的局面下，中國的改革將何去何從？這無疑與中國的政治社會形勢緊密關聯，但也不是一個僅僅由領導者的政治選擇或經濟學家的方案設計決定的簡單問題。要解開中國改革困局這個「結」，需要先分析這個「結」是怎麼形成的。

過去，不少中國經濟學家主要從經濟學的角度，圍繞著理論邏輯進行改革的「沙盤作業」。然而，改革不僅是一個經濟制度與政策的重新設計與轉變過程，也是一個既得利益重新調整的社會變革過程。改革中的很多問題只用經濟學分析也許會有一些局限性。

本文試圖從社會經濟分析的角度，把中國改革以來的社會經濟狀況分成三個階段，研究不同階段改革政策與社會經濟狀況的相互關係，探討中國改革陷入困局的社會經濟原因，以及走出困局的條件。在分析中不僅涉及經濟結構、經濟體制、收入分配、通貨膨脹等經濟現象，也涉及社會意願、社會秩序、制度效能等社會現象。筆者只是一個經濟學者，進行這樣的研究不過是一種嘗試。在過去數年對中國經濟問題的分析中，經

常感到很多經濟現象的出現也需要從社會分析的角度來討論，現在所作的嘗試性分析，是希望換一下角度來認識中國改革的過程與結局。囿於資料限制，對社會現象還只能作一般分析描述，缺少實證數據。同時，在一篇論文中討論如此大的命題，亦很難完整細緻，只是一個粗略的輪廓。

從中國開始改革到現在，大致經過了農村改革、城市改革、改革停滯三個階段。而這個過程中，社會經濟狀況也對應地經過了改善期、不穩定期、壓抑期三個階段。本文將分三章對三個階段作初步分析。並在第四章討論走出困局的一些條件。

一、農村改革的雙重影響

1. 農村改革為何容易成功

中國的改革以農村改革為突破口，取得了成功。與艱難的城市改革相比，農村改革也順利得多。這兩類改革效果的巨大差異，很大程度上與兩類改革的社會經濟基礎不同有關。在中國的集權體制中，集權控制的基本構架是以城市系統為重心的，農村系統則是集權控制的薄弱環節，農村初期的改革不會從根本上動搖集權體制，因此具有特殊性。

但是，當中國從農村改革轉向城市改革時，整個社會對農村改革的特殊性估計不足，而對城市改革的預期過高，由此使得城市改革的道路選擇一開始就受到了局限。

改革之前，以城市為重心的計劃經濟體制與農村經濟體制有兩個關鍵的銜接點，一是農業的集體化經營與計劃化管理，二是農產品低價收購制度。這兩點也正是阻礙農村經濟發展的

主要障礙。就前一點而言，對農民生產的集中計劃管理從來就處於相當粗放的狀態，農業的種植面積與產量計劃常常只是基層與縣政府之間的「紙上文章」，政府真正關心的只是保證國家的農產品收購量。因此，只要農村體制的變化不影響農產品收購量，提高農產品價格又有財政補貼作後盾，農村改革的初期不會對集權體制發生根本性衝擊，這是農村改革比城市改革簡單易行，不會令集權體制傷筋動骨的原因。

實際的農村改革正是在上述兩個銜接點上作了正確的變革，把集體化經營變為家庭經營，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並開放部分農產品市場。這樣的改革易於組織，無論對農村社會或對集中計劃體制都沒有多少風險，政府樂見經濟繁榮、又能繼續基本維持集權體制。成本小而收益大。而對農民來說，他們本沒有什麼與舊體制相關的既得利益，政府基本上不承擔對農民的社會福利保障義務，一向是有取無予，至多是多取少予，所以農民在農村改革中是無所失而有所得，農村改革很自然地在農村獲得了廣泛空前的社會動力。當然，這種狀況是不可能在城市改革中簡單再現的。

2. 農村改革對城市改革的雙重影響

農村改革的成功既推動了城市改革，也使城市居民對改革的預期有所偏差。

農村改革之初，政府對改革效果的預期並不很高，主要是希望藉此解決八億農民的溫飽問題。然而，改革中農村經濟的發展卻遠遠超出了人們的預料。在短短幾年內，以往長期困擾中國的農產品短缺問題有了顯著改善。一九八四年甚至一度出現了暫時的農產品相對過剩，農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更為重要，有深遠意義的是，農村經濟體制逐步向市場機制演變，

中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獲得了巨大的經濟活動空間，農業與農村非農產業迅速繁榮，一批聰明而又成功的農民很快成為新富。農村改革意想不到的成功產生了對城市居民和政府的巨大吸引力。

農村改革事實上對城市改革產生了雙重影響，這樣的雙重影響極大地左右了以後的中國改革進程。雙重影響的一個方面是，農村改革給政府與城市居民極大的鼓舞，政府中越來越多的人希望仿效農村改革，讓城市經濟也有更快的發展，城市居民希望獲得機會改善生活水準，這樣，城市改革的社會動力逐漸形成，城市改革有了社會條件，政府正是在這樣的局勢中開始推動城市改革。

雙重影響的另一面是，在政府和城市居民中，以農村改革的經驗為參照系，形成了對城市改革的簡單認識。它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以為改革就直接是，也僅僅是提高收入和生活水平，由於農村改革對農民沒有多少風險，因此對城市改革可能要帶來的風險並沒有思想準備。事實上，在中國的集中計劃體制中，城市居受到多重保護，其既得利益與集中計劃體制緊密關聯，城市居民是一個與農民完全不同的既得利益集團。城市改革必須改變集中計劃體制，也必然觸及城市居民的既得利益。城市居民只希望提高收入，而不準備在調整既得利益時承擔風險，事實上是不可能的。政府為獲得政治支持，單純宣傳「要給老百姓看得見的好處」，正迎合了民衆的傾向，這樣的許諾隱伏下了一個危機，即把城市改革中的風險攬到了政府自己身上。當然，在集權體制中，政府是很自然地也只能這樣做。第二，以為只要像農村改革那樣，把生產經營決策權更多地由政府部門轉交給生產單位，就能大幅度提高生產效率。無疑，放權確實能改善效率，但其作用遠不如在農村那樣顯著。因為

城市經濟系統中國營企業低效率的原因與農村不同，並不僅僅是因為經營決策權集中計劃管理，還因為存在著政府與企業間的「軟約束」。在「軟約束」的狀況下，不放權固然無效率，放權後失控更嚴重，而效率的改善卻相當有限。要改變「軟約束」，不僅必須根本改變產權關係，而且必須改變現行城市社會福利制度，這一點，政府、城市居民都沒有足夠認識，第三，與上述兩點相關，對城市改革的效果和速度有過於理想化的預期，以為城市改革也會像農村改革那樣，沒有大的障礙即能很快推進，不產生大的矛盾就能大見成效。一直到八八年政府大談「關價格關」時，還抱有某種理想化的預期，希望一舉突破，一役成功。

雖然，也可以說，在城市改革之初，人們沒有經驗，形成上述簡單化認識是很自然的，但是，艱難的城市改革建立在這樣的社會預期上，必然帶有急功近利，趨易避難的特徵。有趣的是，在城市改革前期，也正是由於存在著這樣的社會預期，城市改革才可能突破意識形態障礙，獲得廣泛的社會支持。

二、雙軌體制的形成與社會成本

1. 形成雙軌體制的經濟社會條件

中國城市改革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利用和擴大了雙軌體制，逐步向市場機制過渡。所謂雙軌體制，是指計劃體制與市場體制的並存，它在城市改革之前就已存在，中國的計劃管理從來就沒有完全控制整個國民經濟，鄉鎮企業從誕生之日起就是依靠市場機制生存的，城鎮集體企業，從來實行過嚴格